

## 開館盛況

一月三日，醒獅在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先生點睛後隨即生龍活虎地舞動，展開香港電影資料館暨港島東體育館的開幕典禮。開幕禮在香港電影資料館和港島東體育館的廣場舉行。

主禮嘉賓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梁世華先生、副署長（文化）蔡淑娟女士、助理署長（文物及博物館）馬啓濃先生、電影及文化交流總經理羅德星先生、本館館長廖昭薰女士、節目策劃羅卡先生、研究主任余慕雲先生等的陪同下，先後欣賞開幕展覽《光影中的香港》及到資源中心和資料儲藏庫參觀。妙語如珠的發哥更在電影院中接受眾傳媒訪問。而眾與會嘉賓皆在精心佈置的會場和在參觀資料館時歡聚。



主禮嘉賓（左起）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梁世華太平紳士、東區區議會主席丁毓珠太平紳士、電影紅星周潤發先生、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太平紳士、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 GBS 太平紳士、香港藝術發展局主席何志平太平紳士、建築署署長鮑紹雄太平紳士



主禮嘉賓周潤發先生代表聯華影視公司及安樂哥倫比亞三星影片公司致送《臥虎藏龍》（2000）拷貝予本館。



曾蔭權先生在（左起）康文署副署長蔡淑娟女士、署長梁世華先生、（右一）本館館長廖昭薰女士的陪同下參觀資源中心



本館節目策劃羅卡先生（左一）與主禮嘉賓參觀《光影中的香港》展覽



康文署助理署長（文物及博物館）馬啓濃先生（右一）接受雲娜珊迪女士（泰國國家電影資料館）致送紀念品，左一為康文署文化交流總經理羅德星先生



遠道而來的電影資料館家：（左起）朴珍石先生、賈佩女士、雲娜珊迪女士、愛密遜先生、宋琨先生、厄柏提也先生、岡島尚志先生、陳倫金先生和王學明先生



（左起）余慕蓮女士、余慕雲先生、林蛟先生和曹達華先生



（左起）黃奇智先生、姚莉女士、顧錦華女士、裘萍女士和張錚先生



錢似鶯女士（左）和童月娟女士（右）



李壽祺先生（左）和張同祖先生（右）



姚莉女士（左）和方保羅先生（右）



朱虹女士（左）和曹達華先生（右）



（左起）王煥珍女士、余慕蓮女士和張錚先生

## 回顧歷史、前瞻未來： 亞洲電影資料館的重任

何思穎



（左起）岡島尙志先生、何思穎先生、愛密遜先生、賈佩女士、廖昭薰女士、厄柏提也先生、雲娜珊迪女士、李天碩先生和朴珍石先生在本館前留影。

「我和許多大導演握過手，那真叫人雀躍，但總不及觸摸着盧米埃兄弟的影片原片那樣令人興奮。」東京國立現代藝術博物館國立電影中心研究主任岡島尙志，在一個款待來港出席香港電影資料館開幕典禮的亞洲電影資料工作者的宴會上這樣說。

「電影資料工作者是一種異類。」東南亞／太平洋影音資料館協會主席愛密遜在一月八日舉行的研討會上表示。「他們酷愛電影，但愛歸愛，也得按捺住自己的感情。」所以岡島鄭重提到儘管他觸摸着那些古董膠片時興奮莫名，卻也小心以免把指紋印在上面。

### 拯救之旅

電影資料工作者是保存電影遺產的前線人員。電影的歷史也許是光輝的，但電影的物質遺產卻是脆弱的。自一八九五年盧米埃兄弟發明了放映電影以來，全世界便一直為挽救膠片的聲光疲於奔命。

開始時這努力換來的卻是嘲笑。愛密遜援引了一八九七年英國一份報紙對大英博物館收藏電影大加責難的報道：「認真說句，蒐集垃圾不是有點荒謬嗎？」直到三十年後，電影資料館才在歐美出現，愛密遜幽默地說這是為「垃圾成家立室」。

比起歐美，亞洲的電影遺產更加脆弱。亞洲最早有電影資料館的國家是伊朗、中國和印度，分別成立於一九四九、五八和六四年。在亞洲，日本是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做得最好的國家，但也要到七十年代才開始以國立電影中心的名義有系統地保存電影。

香港是全球電影生產量最高的地方之一，但成立電影資料館的呼聲要直至七十年代末才響起。不是香港人不關心電影，只是社會民生還未穩定，誰會關心電影的保存。九三年香港電影資料館籌劃辦事處始告成立，任務更形艱巨。

菲律賓資訊中心電影部總監賈佩在研討會上表示，當地電影雖然歷史悠久，卻還沒有正式的電影資料館。其實，馬可斯政府在八二年已成立了國家電影資料館，但隨着三年後政權被推翻，資料館也被收編於電檢部門內。電影資料工作現在由有心人組織的電影資料工作者協會（SOFIA）肩負，但由於缺乏資源，它只是進行聯絡和安排電影保存的工作。

政治動盪在亞洲實屬家常便飯。事實上，亞洲長久而輝煌的電影史，與其慘痛的歷史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世界大戰、大大小小的內戰，以及種種政治和經濟動亂，沒有一樣對電影保存工作有利。再加上各種殖民或專制統治，當權者對過去要不加以歪曲，要不避而不談，形成一種拒絕面對歷史的態度。

## 困阻重重

亞洲的電影資料館因此必須克服重重困難。亞洲的電影工業歷史悠久、產量驚人，電影保存工作起步遲，大量珍品早已散佚。情況之嚴重，在印度可見一斑。印度是世界上電影產量最高的國家之一，根據印度國立電影資料館館長厄柏提也指出，印度每年平均拍攝七至八百部電影。由於沒有法定儲片制度，大量電影難逃湮沒的命運。單以默片而言，一九一三至一九三一年間，印度拍攝了一千三百部電影，存留至今的不足十二部。

無心的毀壞是資料工作經常碰到的問題。厄柏提也在研討會上指出，電影公司在影片失去商業價值後，便會隨意毀掉。賈佩補充，菲律賓人更會焚燒膠片以抽取銀質圖利，而愛密遜更舉了一個為電影而毀壞影片的例子。他播放了一部二十年代澳洲電影的片段，一艘船正陷身熊熊火焰之中，而導演製造這個效果的方法，便是在船上點燃舊電影的膠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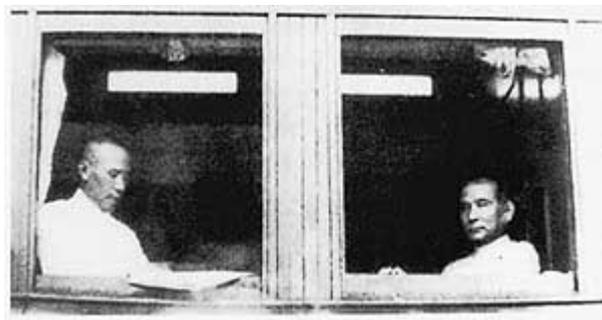
缺乏恰當的儲存設施和妥善的保養程序也導致很多損壞。在南亞和東南亞那些電影工業蓬勃的地區，和暖的氣候給影片帶來嚴峻的考驗。以印度為例，炎熱、灰塵和濕氣是「電影保存的三大害」。香港的情況也不遑多讓。香港電影資料館館長廖昭薰說，有些影片在空氣閉塞的環境中儲存經年，已到無可救藥的地步，資料館人員無法不放棄它們。事實上，香港電影資料館約有三分之一藏品是從北美收藏家或華埠戲院尋回，因為當地儲存環境和氣候也較為合適。

儲存設施足夠了，往往又有空間不足的問題。香港電影資料館籌劃辦事處自九三年成立以來，積極的搜尋工作，換來了驕人的成績，業界和公眾的反應均十分熱烈，以致二〇〇一年正式開館時，儲存庫已幾近滿溢。此外，很多資料館經費不足，無法置辦必要的器材，或調遣人手進行迫切的工作，或讓工作人員接受適當的培訓，往往錯失保存或修復的良機。此外，在分享搜集所得的珍寶時也經常發生問題。《孤島天堂》（1939）是資料館最早期的國語藏片之一，尋獲的拷貝有嚴重的次序倒錯問題，但由於缺乏創作背景資料，不能正確地還原。基於與公眾分享的信念，只能在放映時在片首以字幕解釋。

## 成就背後

儘管面對種種困難，亞洲的電影資料館仍有許多值得引以為傲的地方。它們排除萬難，保存和修復了大量瀕於毀爛的電影文化瑰寶。香港電影資料館開幕誌慶節目《亞洲電影資料館珍藏》，就是它們成就的明證。

是次放映的影片包括了多個新近修復的拷貝，每部背後都有一個為保存電影文化而付出巨大努力的故事。《勛業千秋》（1924-27）是一部有關民國初期的珍貴紀錄片，由香港先鋒影人黎民偉攝製，過去一直由黎氏家人保存，七十年代更進行修復，後來卻因故散佚了。黎氏後人幾經努力尋回後送給資料館保存。



《勛業千秋》（1924-27）



印度電影《黑天神》（1927）



越南電影《自由鳥》（1962）

反殖解放戰爭片《自由鳥》（1962）今回與香港觀眾見面的三十五毫米拷貝，是根據越南電影資料館一九九四年偶然發現的十六毫米殘本修復的。默片《黑天神》（1927）是印度宗教電影，最近才經印度國立電影資料館修復，重現昔日光彩。菲律賓電影《我的愛》（1939）是當地僅存的四部戰前電影之一，澳洲國家影音資料館與菲律賓新聞局合作將這部作品修復，作為祝賀菲律賓建國一百周年的賀禮。日本經典默片《瀧之白糸》（1933）由大師溝口健二執導，是次放映的全新修復版，由日本國立電影中心於一九九九年從三個現存的十六毫米拷貝剪輯而成。

亞洲各國的資料館還有許多傑出的成就。中國電影資料館除了搜集和保存了大量影片外，也努力出版參考書、電影史、畫冊以及電影研究等方面的書籍，與讀者分享該館豐富的瑰寶。菲律賓的SOFIA 雖然是資源有限的民間組織，但卻協調國內和國際的機構，完成了不少有意義的工作。日本國立電影中心在電影公司冷淡對待的情況之下，仍搜集了大量本國電影作品。印度的國家電影資料館搶救了很多國家電影財富。目前，該館正將其工作範圍逐漸擴大至保存電視材料，並且正在建設一個硝酸儲片庫，以存放易燃片。

### 保存文化記憶

香港方面，電影資料館得到公眾和業界的熱烈響應，搜集到數量龐大的拷貝和相關物品，並且已經妥善地保存和進行修復，令這些長期受到忽視的文化遺產得以重獲新生。其實，香港電影資料館在正式開館前，已有舉辦各種服務公眾的活動，包括大大小小的展覽以及出版多種刊物，呈現香港電影史的多種面貌，讓影迷得以分享資料館的工作成果。

電影資料館在保存各國的文化記憶方面，其實肩負了重要的使命。愛密遜在研討會中指出，二十世紀的電影記憶以歐美為主，這種情況「不可以也不能繼續下去」。他重申二〇〇〇年東南亞／太平洋影音資料館協會提出的「新加坡宣言」，指出「二十一世紀的影音記憶必須忠實且公允地反映所有國家及其文化」。

亞洲電影在這世紀轉換的時代的確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華人電影已在世界電影殿堂中取得鞏固的席位。而具有優良電影傳統的國家如菲律賓、印尼，特別是日本，也繼續發放光芒。至於南韓、泰國以及新加坡的商業和藝術電影，也嶄露頭角。更加令人鼓舞的是，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大氣候之下，亞洲各國的電影正在通力合作，一方面對抗好萊塢的強勢入侵，另一方面探討藝術和娛樂的共同價值。

西方近來常說二十一世紀是亞洲世紀。對很多亞洲人來說，這種說法無非是言過其實，甚至是吹噓之言。然而亞洲肯定會在愈來愈全球化的時代中肩負起舉足輕重的角色。亞洲電影未知能否保持二十世紀末的出色表現，幫助締造一個愈形平等的世界。但無論如何，亞洲各地的電影資料館在其保存脆弱的文化遺產使命中，也成為這個重要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回顧歷史的重任，也包含了前瞻未來的遠景。

（翻譯：曾憲冠）

何思穎，影評人，高空飛行來回於香港及美國德克薩斯州兩地。

## 光榮地退而不休的慕雲叔

數月前祝賀慕雲叔（自九五年出任本館研究主任的余慕雲先生）七十大壽之際，大家喜見他身壯力健依然，然而，已屆退休之年，慕雲叔在本館開幕後便轉以特約的形式協助資料館。

資料館成立籌劃辦事處之初，館中還沒有甚麼可觀的館藏，慕雲叔逐漸把家中豐富的雜誌、文獻等藏品轉交資料館，並仔細地給我們解釋各項文物的來龍去脈，同事們獲益良多之餘，亦深深為他的幹勁和無私而感動。慕雲叔和研究助理周荔嬌小姐在開幕前一直身兼策劃電影放映和展覽節目的職務，可惜二人在開館後因不同理由離職。幸而他們抱着一直以來的熱誠，仍會不懈地為香港電影的研究工作而努力。

除了搜集得如山的寶庫，慕雲叔自小在香港影圈的親身閱歷豐富，每逢我們遇到甚麼（尤其是早年影圈）問題或需要甚麼資料，他總是竭力幫忙。慕雲叔，我們以你為榮！



康文署助理署長（文物及博物館）馬啓濃先生（左一）讚譽慕雲叔是「香港電影資料館之父」。



與慕雲嫂（前排右）、（後排右起）慕雲叔的長期拍檔助手周荔嬌小姐及新任研究主任黃愛玲女士合照。

## 相見歡——業界交流與參觀

爲了增進與業界人士的了解，我們非常歡迎影人前來資料館參觀，並陸續邀請各電影公司的負責人到訪。資料館無論在館藏和設施上，可以如何精益求精呢？與業界人士不斷交流，除了可增強他們對我們的信心，捐贈電影拷貝和提供資料來豐富這個爲大眾服務的香港電影寶庫，亦讓我們了解他們的需要，進而爲業界提供服務。

嘉禾娛樂事業（集團）有限公司的鄒文懷伉儷、諸兆俊先生，東方電影集團有限公司的黃百鳴先生，東方電影沖印（國際）有限公司的黄潔珍女士，英皇集團的陳嘉上導演，春天電影製作有限公司的高志森導演，寰亞綜藝集團有限公司的莊澄先生、馮永先生、嚴嘉念女士，美亞娛樂資訊集團有限公司的周其良先生、馬偉豪導演、唐慶枝先生，以及甘國亮先生、馬逢國先生、鄭佩佩女士、狄龍先生、陸離女士、何藩導演、黎傑先生、彭志銘先生、周信芳先生等電影界及文化界的朋友，在一、二月間相繼到訪資料館，參觀館內設備先進的倉庫與資源中心，並討論相互合作的可能性。



（左起）諸兆俊先生、鄒文懷伉儷、本館圖書館助理館長曾運球先生及館長廖昭薰女士



本館館長廖昭薰女士（中）與寰亞公司的馮永先生（右一）、（左起）嚴嘉念女士和莊澄先生，及寰宇公司的林小明先生（右二）。

電影節目：

《笑聲、歌聲、紅星》中的紅星

任艷蘭

五、六十年代是艱困的年代，也是香港電影發展最蓬勃的年代。戰後大量難民自中國大陸南移到香港，香港人口急速膨脹，住屋和就業問題嚴重，《一樓十四伙》（1964）的情況屢見不鮮，招工廣告前長長的求職人龍也屢在五十年代的電影裏出現。五十年代的電影觀眾就是以這些基層人民為主，在這種居住環境擠迫、人浮於事的情況下，電影世界是人們最自然的避難所，而當中，喜劇最是能讓人消愁解悶。因此，五十年代出產了不少反映基層生活實況的喜劇，譬如《樓下門水喉》（1954）等，也造就了不少獨當一面、擅演市井小人物的喜劇紅星，新馬仔、鄧寄塵、梁醒波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他們為當年的人帶來許多笑聲和歌聲。

戰後出生的一代，父母經過五十年代的打拚已紮下穩固的基礎，他們不用像前人一樣，年紀小小已要為口奔馳；工業也在此時起飛，西方文化開始滲入，年輕一代在歐西文化的衝擊下，開始有自己的價值觀。他們接受西式教育，喜歡聽歐西流行曲，崇尚占士甸的自由、無拘無束的生活態度。傳統的反映小市民生活實況的喜劇已不能滿足這些年輕人，「他們要製造青春歡樂，而不再是苦中作樂」，因此六十年代湧現很多類似《蓬門淑女》（1967）和《蔓莉蔓莉我愛妳》（1969）等載歌載舞的喜劇。陳寶珠、蕭芳芳等能歌善舞的青春玉女撐起了六十年代香港影壇的半壁天空，各自成為工廠妹和學生妹的超級偶像。

《笑聲、歌聲、紅星》網羅了多位喜劇紅星的作品，新馬仔、梁醒波、蕭芳芳、陳寶珠等兩代紅星同時為大家發放笑彈。

任艷蘭為本館助理編輯



《蔓莉蔓莉我愛妳》（1969）是寶珠（左）和奇哥（右）歌舞版的「心心相印」之作。



諧星鄧寄塵「失魂」的演出令人嘻哈絕倒。圖為《失魂魚》（1951）。



梁醒波（右）和譚蘭卿（左）是一對活寶，在《璇宮艷史續集》（1958）中爆發幽默與趣怪。

展覽：

《五十、六十年代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製作手記

任艷蘭

是次展覽的籌備過程結合了教學和活動，讓參與者全情投入。事緣本館節目策劃羅卡先生，去年中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郭少棠教授，談起構思中的《衣食住行》展覽，郭教授認為電影是觀看港人日常生活演變的重要媒介，因而開設「社區日常生活與電影文化」課程，使用資料館提供的影像資料作為教材一部份，並鼓勵學生參與籌備這次展覽。資料館也一直希望能加強和外界交流，此事可謂一拍即合。



羅卡先生透過影片片段引導學生們討論。

年輕學子一般只能透過電視在早上或深夜的「粵語長片」時段，偶爾接觸到這些老電影，除了少數「長片」迷外，他們對粵語片的認識多數不深，甚至覺得舊片是沉悶和過時的。透過這次交流，他們到資料館觀看館藏的一些五、六十年代的電影錄影帶，在當中找出港人在其時的衣食住行的特色與轉變，然後大家再來討論分析，着實加深了學子們對香港舊電影的認識，一改他們對「粵語殘片」的印象。



《妙人奇遇》（1963）



《飛哥跌落坑渠》（1967）



《乖孫》（1964）



《隔離鄰舍兩家親》（1964）

《五十、六十年代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展覽分為「衣食」和「住行」兩部份展出，分別由二月十二日至廿八日以及三月五日至十八日期間舉行。學生們經過觀看影片、討論和分析後，歸納出不同的小題，交由節目組整理與甄選。展覽根據這些小題，找出相應的影片場景和劇照，經過放大和加工後展出。學生們亦參與編寫文字簡介部份。觀眾可透過這次展覽，回顧五、六十年代香港市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特色，饒有興味，亦從中可見香港如何從傳統走向西化，外來文化潮流如何改變港人的生活方式。

資料館一直強調交流的重要，與大眾分享香港的電影文化正是「與眾樂樂」精神的體驗。任艷蘭為本館助理編輯